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李得钊传

刘江波 著



刘亚生 (1910—1948)

邓演达 (1895—1931)

李耘生 (1905—1932)

孙晓梅 (1914—1943)

侯绍裘 (1896—1927)

高文华 (1908—1931)

邓中夏 (1894—1933)

卢志英 (1905—1948)

贺瑞麟 (1909—1928)

项英 (1898—1941)

顾衡 (1909—1934)

夏雨初 (1903—1930)

袁国平 (1906—1941)

孙津川 (1895—1928)

朱务平 (1899—1932)

朱克靖 (1895—1947)

丁香 (1910—1932)

冷少农 (1900—1932)

施滉 (1900—1934)

邓振询 (1904—1943)

任天石 (1913—1948)

周镐 (1910—1949)

陶家齐 (1890—1943)

恽代英 (1895—1931)

吴振鹏 (1906—1933)

何宝珍 (1902—1934)

徐楚光 (1909—1948)

陈子涛 (1920—1948)

谢文锦 (1894—1927)

陈君起 (1885—1927)

成贻宾 (1927—1949)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李得到传

刘江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得钊传 / 刘江波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12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ISBN 978-7-214-21645-8

I. ①李… II. ①刘… III. ①李得钊(1906-1936)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9749 号

书 名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李得钊传

著 者	刘江波
特 约 审 稿	陈亦工
责 任 编 辑	陈 颖
特 约 编 辑	聂红琴
责 任 校 对	王 溪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8.25 插页 2
字 数	10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645-8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001
-----	------

第一章 一个基督徒的童年	/005
--------------	------

家世与童年	/005
-------	------

蒙馆与新学堂	/009
--------	------

自我意识的觉醒	/014
---------	------

第二章 投身革命	/023
----------	------

深受永嘉文化的滋养和进步刊物的影响	/023
-------------------	------

加入革命组织	/032
--------	------

反帝先锋	/037
------	------

第三章 从“弄堂大学”到“教育殿堂”	/043
--------------------	------

心灵的滋养	/043
-------	------

风雨如磐青云里	/048
---------	------

奔向莫斯科	/054
-------	------

第四章 风华恰正茂	/059
-----------	------

东方大学：幸福的记忆	/059
------------	------

毁誉参半的旅莫支部	/063
-----------	------

在磨砺中成长	/068
--------	------

第五章 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战斗	/073
----------------	------

主心骨	/073
-----	------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	/082
相忍为党	/084
那一支红色武装	/087
第六章 一掬丹心铸忠魂	/091
在刀锋上跳舞的人	/091
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100
第七章 尾声	/111
主要参考文献	/116
后记	/122





引 子

001

在 1949 年 9 月 30 日的夜晚，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秋风飒飒，一群人正在金水桥前忙碌。他们在对由三根自来水管拼接而成的电动升旗装置进行紧张的调试，因为明天就是四万万人梦寐以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了。

此时，一个刚进北京的 15 岁少年正在京西一所寄宿学校的寝室，他光着消瘦的身体，裹上被子趴到窗前仰头眺望。月儿尚未圆满，流星划过苍穹。少年想起奶奶讲过的故事，天上每划过一颗流星，地上就有一个灵魂升空，把人们的意愿捎给上天。

这个少年名叫“囚童”，他有两个奶奶——张奶奶和夏娘娘。她们对囚童而言，都非亲人却胜似亲人。四川营山的张奶奶每每讲些祥瑞菩萨和云端神仙的故事，他们个个积德行善，普度天下。而苏州反省院里夏娘娘的故事则是铁牢中关不住的童谣，是黑夜里漫过心田的一股清波。囚童在襁褓中听着童谣睡去、醒来，像一株小苗被清波滋润着渐

渐长大。后来在延安，囚童在夏娘娘住的窑洞前听她讲故事，那是黄土高原上的雷电豪雨，浩浩汤汤，荡涤肺腑。夏娘娘把囚童的父亲李得钊烈士的身世——那些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故事——永远留在了囚童心中。他从此知道父亲是为国而死，也懂得了什么是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

就在囚童眺望流星时，他的母亲周惠年正在一盏灯下为刚进城的儿子缝制御寒手套。深秋，冷雨，北京的夜空清冽如洗。突然，周惠年的手被针刺了一下。她倒吸一口气低头看，指尖已渗出血滴。周惠年轻吮指尖，心里猛然一颤。啊，明天就是开国大典了，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时刻啊！

越是幸福的时刻，越容易想到逝去的亲人。20世纪30年代，周惠年常在独自支撑的守望中挨过时光。除了早亡的父母，她的亲人还有三位丈夫——谭忠余、李得钊、黄文杰，他们都是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过程中英勇牺牲的共产党人。这么多年过去了，尽管从未有过花前月下，但对三位革命丈夫的追忆陪伴了周惠年的一生。她的回忆无语而绵长，结尾每次都是三个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化作一副清癯的面庞。那分明是李得钊，他刚从马立斯新村的办公处回家，与站在窗下向门口张望的周惠年对视，眼睛里都是牵挂与担忧，然后松开深锁的眉头，莞尔一笑。

不言爱，尽是爱。周惠年是个信仰专一、感情专一的人。13年前，她亲历了李得钊在黑暗中倒下，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沉重而又难言。从那以后，她将与李得钊的心灵呼应埋在记忆深处，不再提起。然而，遗忘比记得更痛苦。现在，在北京，在萧瑟秋风中温暖的灯光下，那份沉重终于释放了。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周惠年泪流满面喃喃自语：得钊！你为之奋斗的胜利终于实现了，明天一早，我就要和咱们的儿子去聆听新中国诞生的钟声了，为了这一天，我们曾甘愿付出一生。此时此刻，你一定在微笑吧？

第二天，周惠年和囚童分别跟随单位和学校的队伍去了天安门广





场,就像两滴水汇入了浩瀚的大海。在开国大典上,他们同广场上的几十万人一同看到了登临主席台的共产党领袖、人民解放军将领和人民政府领导人,听到了寓意共产党奋斗牺牲 28 年的礼炮声响,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整齐雄壮的解放军队列前阅兵。人们热血沸腾,向一代伟人毛泽东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气壮山河的声音在广场上隆隆回响,天安门成了全中国的焦点。当人们伫立致礼,注视着革命者用鲜血染成、象征民主团结的国旗冉冉升起时,周惠年的热泪再次奔涌而出,酣畅淋漓地流淌下来。

夜晚,五颜六色的礼花腾空而起,璀璨夺目。囚童欢呼着、跳跃着,稚嫩的嗓音淹没在巨大的声浪中。他抬头仰望,天幕中闪出了父亲模糊的身影。囚童从未见过父亲,在母亲无数次的描述中,父亲很清瘦,身着长袍,是一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模样。现在,父亲在天幕中向他走来,犹如玉树临风,眉梢眼角果如母亲所述的那样满是欣慰的微笑。他俯瞰广场上欢乐的人群,然后在璀璨的礼花中悄然隐去。囚童想,虽然父亲没有亲眼看到胜利,但他把胜利献给了人民的伟大节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无数共产党人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在疯狂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时,李得钊,这个年轻而儒雅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毅然放弃好不容易获得的富裕阶级地位,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他是在反革命的屠刀下,保护了有限的革命火种,从而为中国的土地革命准备了一大批干部?他又是如何以磅礴激扬的文字宣传人类历史之演进必然归结到的共产主义,并协助周恩来在国民党势力的核心区域创建起一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红色武装?后来他被捕了。当上级和下级都已叛变,尊严和气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时,为什么李得钊却能以生命为代价严守党的秘密,给世人留下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今天,欢歌已经代替了悲叹,笑脸已经代替了泪颜。人们享受着“李得钊们”披荆斩棘而争得的幸福,正在全力建设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社会大变革中的人们需要答案,需要了解什么是大浪淘

沙时的沉渣泛起,什么是冲天烈焰过后熔炼为金的珍宝。

这一切激励着笔者,于是倾尽虔敬之力,开始了对李得钊足迹的探寻。对它追寻和思考的时间愈长,它在心灵中唤醒的敬畏就愈发深厚。从新文化运动到全民族抗战的前夜,穿越尘封的历史,笔者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中看到了人格的隽永,看到了支撑在人背后的社会变迁,也看到了昨天的坐标,今天的轨迹,以及,明天的梦想。





第一章

一个基督徒的童年

005

家世与童年

李得钊，又名德昭，字华玉、伯明，曾化名一粟、乔（音）、林志明等。公历 1906 年 12 月 9 日，李得钊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岩头（旧称港头）李宅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

永嘉，自宋、元、明、清以来就与温州属同一地理概念，是位于东海之滨、瓯江南岸的广袤区域。李得钊出生的永嘉位于瓯江之北，是狭义上的永嘉。永嘉历史悠久，早在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瓯越先民在此生存。公元 323 年，东晋明帝司马绍置永嘉郡，永嘉作为郡名自此始。公元 589 年，心气儿颇高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力推改革，废郡设州，以州统县，将县治设在今温州市鹿城区，永嘉从此成为县名。到



了1911年,中华民国实行省、县两级制,永嘉县先直属浙江省,后归瓯海道管辖,设道尹行政公署于永嘉县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废道,恢复省、县两级制,设专员公署于永嘉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8年,永嘉县治迁驻上塘镇。出上塘镇北行六十多里,就是李得钊的出生地——楠溪江中游的岩头。

楠溪江(古称瓯水)发源于罗垟岭西侧,干流全长一百四十公里,沿着苍山、雁荡山之间的河谷一路南下,把二十多条支流像扇子一样分布在连绵的低山丘陵之间。这里温暖湿润、水土沃美,很适宜作物生长,但每年八九月间台风带来的飓风豪雨,常把田园村落泡在洪流中,造成作物绝收,飘屋溺人,令人惨不忍睹。

特殊的地形地貌,加上自古以来陆路运输仰赖民间小道,出门步行尚须背驮肩挑,使永嘉成为一块僻远之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实行五口通商,上海、厦门、宁波渐次开埠,40万箱鸦片一船船运进来,4亿银元堂而皇之运出去。开埠久了,永嘉不仅繁华起来,还辟出了一条经水路外出的途径:从岩头出发,走石路到楠溪江边,用竹竿撑蚱蜢舟沿江而下,至上塘换驳船南行,在楠溪江汇入瓯江之处即可看见温州府的城门,再换乘轮船,在潮乎乎的咸腥空气中北行两天一夜,便到大上海了。

两头尖尖的蚱蜢舟带走了对外面世界认识不甚了了的岩头人,带回了令人神往的大量信息。经海路去上海的人多了,人与外界的关系悄然改变,坚忍不拔的山地农民渐渐兼有了海派气质,眼界开阔了许多,孕育出一人发达不够,还带着本根姻亲一起发达的族群文化。这里本就民风强悍,人们常以极端手段与命运抗争,大不了以命抵命。自从接触了新鲜消息,沉默的羔羊便愈发骚动。要生存,要活路。胆子大一点的就铤而走险,以匪作乱的方式反抗盘剥。因此这里的匪患也一年年多了起来。

李宅村是李姓人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之处。村里最宏大的建筑是祠堂,由族中名士出资建造。祠堂的建筑颇为讲究,砖木结构,白墙灰瓦,两进两廊。每逢重要年节,本族人都在这里祭祀祖先,平时则



由族首挑头处理族内事务，以此延续数百年来维系人心的作用。

尽管楠溪江沿岸有秀水奇岩和星罗棋布的古村落，是一处诗情画意的所在，但李得钊从记事起就晓得，这里的山水神韵都不属于他和父亲、母亲。对于父母，李得钊在成年后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填写入学登记表时，在“父亲”一栏中只用了寥寥二十几个字：“父，立勋，56岁，识几个字，种田为业，财产无，收入聊足自给。母，已故。”

李氏始祖峽公自后晋年间迁来岩头，迄今已一千余年。从始祖算起，到李立勋（1874—1967）这儿已是第34代。李立勋有个弟弟李立统，小自己两岁。不知是上几代人遭遇过变故，抑或是祖上从来就非望族的缘故，李家兄弟俩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仅无田可耕，亦无资本织绸熬盐制陶，只能靠李立勋替人缝鞋、李立统打短工为生。在乡邻的记忆中，李立勋总是一刻不停地敲打锤钉，手里的针线在鞋底与鞋帮间上下翻飞。因所得工钱甚微，生活难继，他不得不于制鞋之暇种些番薯粟米，春耕秋收勉强自足。

李立勋直到30岁出头才娶妻，32岁才有了儿子。尽管这个贫穷的农民给儿子取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得钊（德昭）——寄望儿子得到上天勉励，并彰显美德，他却依旧与妻儿过得很艰难。由于长期缺食，李得钊一落生就十分瘦弱，但他弱小的身体里充满了生命力，就像一盏风中灯烛，顽强地摇曳着一簇火苗。

李得钊的母亲目不识丁。按照中国旧式风俗，女子命如草芥，不配有名字。她留给李得钊的印象很少，以致他做不出关于母亲形象的准确描述，只是记得母亲总是一副青白的脸色，面颊消瘦，颧骨突出，说话低声柔和。幼小的李得钊倚靠在她的怀里，头发上落下母亲冰凉的泪珠，常听到从母亲瑟瑟发抖的胸腔里发出长长短短的叹息。

李得钊6岁时，母亲忧病而亡。李立勋承受着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抑，在命运边缘挣扎不脱，渐渐恍惚起来，终于精神错乱，一旦发作起来，就口吐白沫比比划划，癫狂乱舞，不能自理。李立勋因贫致病，又因病而一贫如洗到了极点，引发乡邻怜惜。只要他稍稍清醒，村中基督徒

聚会点的教友便三五成群约他去岩头教堂做礼拜。

楠溪江沿岸的教堂遍布乡野，牧师比官府的官员还要多，人民崇尚耶稣的习俗极盛。耶稣给李立勋提供了死后进入天堂的希望，使他有了盼头。他每天面朝天空，祷告上帝祈求照顾：“主啊，请召唤我的心”，“主啊，请听我诉说”，他的心渐渐平静下来，竟至病愈。从此，他皈依了远渡重洋而来的基督教，不再敬本土鬼神和东瓯王。后来，李立勋被牧师收为教堂杂工，就更加虔诚了。圣经和圣诗本给不识字的李立勋以精神食粮，使他清除了忧郁和痛苦，性格也愈加平和。

然而，耶稣并未改变李立勋的命运。贫苦的李立勋虽正值壮年，却因贫而无法再娶。李立勋也一生未娶。按永嘉风俗，儿子成婚即分家。李家兄弟一个鳏夫、一个不娶，始终未分家。二人终日劳作，勉力抚养着一脉独传的李得钊，给了这个无母的孩子双倍的父爱。

李得钊自懂事起就未见父亲有过英姿勃发的样子。父亲个子不高，因为总是佝偻着身子耙田、清扫，就显得更加矮小。他寡言少语，也不在乎有无别人关注，因为上帝已教会他救赎灵魂。直到李得钊长大成人，只要忆起父亲，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头上顶着一圈白发，腰弯成小山包，对所有的压迫都隐忍着，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的教堂杂工的形象。

李立勋常带着儿子去教堂做礼拜。他不曾想到，儿子尽管像他一样内向，却是个悟性极高的早慧少年，尤对外语有相当高的领悟力，加上天天与牧师在一起，渐渐地，李得钊不仅能与英人对话，还能用英文写作。那一手利落的英文字母，写得像毛笔小楷一样娟秀工整。

听到牧师和乡邻对儿子的赞许，李立勋濒于死灰的心复活了，他感激耶稣让他安身立命，也日益盼望儿子将来能有个正途功名，甚至于买田起屋，光宗耀祖。为此，李立勋领着儿子去教堂受洗，加入了基督教温州偕吾会。小孩子尽管并不懂得上帝，但心里边还是跟父亲一样，对无所不知的主很是虔诚。

温州偕吾会（即偕我公会）是基督教派英国偕吾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 1911年改名圣道公会）在中国温州所设的组





织。1878年,英国偕吾会将牧师李华庆(Rev. R. Inkermann Exley)派往温州。李华庆病逝后,1882年,牧师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接替了他。苏慧廉在温州传教24年,对温州的宗教、教育、医疗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82至1906年,苏慧廉在任基督教温州教区长期间,建立教会150家,发展信徒2144人,慕道友5711人。他的亲力亲为,使温州笃信耶稣的基督徒人口比成为中国之冠,温州成了中国的“耶路撒冷”。苏慧廉学会了很难懂的温州话,并用温州话宣讲福音。他翻译了整部《新约圣经》,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茉莉花》歌词改成《圣经至宝》,供教友唱诵。他还用拉丁字母为温州方言注音,使乡村妇孺学此法一两个月,即可读圣经。

李得钊的语言潜能被拉丁字母拼音法激活,为读懂圣经以及给日后学习英文打下了基础。少年李得钊由读圣经起步,进而掌握了一门距“瓯语”很远的英语,助他在青年时期接受了外来新思想,最终又决然离开了父亲指定的信仰之路。父亲身上的农民的勤劳质朴和基督徒所持的虔诚与执着,两种教养相互融会,对李得钊的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人也愈加温雅而刚强。

蒙馆与新学堂

永嘉的耕读文化根深蒂固,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与李立勋家为邻的岩头富豪武进士家,常在门框上贴对联。天资聪颖的李得钊不仅唱圣诗即能和调,对武进士家的对联也是指联字即能认识。李得钊6岁时,已到了入塾从师的年龄,却因家贫而不得入学,遂有乡邻纷纷向塾师游说。塾师终于发现,这个令人们啧啧称奇的孩子果然颖慧,便破例收下了他。

永嘉的私塾始于晋朝,兴于南宋。到了明清,书院与学塾已遍布乡村。学塾属宗族私产,往往延请一些考不上功名的读书人前来开蒙农

家子弟，于是被称为蒙馆。浙江的蒙馆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楠溪江沿岸的村落都设有蒙馆。

岩头蒙馆的塾师着长袍、结长辫，将一张老得褪色的书案置于北墙靠东的窗下。十几个孩子坐在书案右侧的桌子后面，桌上摆放着笔墨纸砚和课本。新生发蒙要择吉日。蒙师在书案上的十魁碗里摆些小吃食。新生与老生共食后，李得钊须在红毡毯上跪拜，塾师手把手教他在习字纸上执笔填写“上大人”，写毕，在字上密密加圈。李得钊再拜谢塾师，又拜谢长辈，发蒙仪式就算完成了。

在蒙馆读书的孩子，要各家分摊费用，还得自备课桌凳子。塾师怜悯李得钊家贫，已免去学费，但李家仍拿不出桌椅。李得钊找出自家砧板，请叔叔李立统给砧板钉上四只脚，一张书桌便做成了。永嘉的砧板多以乌柏木制成。李家的长方形砧板虽简陋，但质地坚硬，纹路细腻，权当书桌，本也不乏一番贴切，但当地深受温州奢靡之风的影响，就连乡下百姓也喜好攀比。于是这砧板桌子就招来富家子弟的嘲讽，成为蒙馆里无端的话题。听到嘲讽，李立统总是默默落泪，李得钊却只当没听见，反而安慰他说：“我不同他们比桌凳衣着，我是来读书的！”少年李得钊如此懂事，一时引为佳话，在乡邻中流传至今。

每天早上，李得钊穿着破旧的衣服，挎着破旧的书包走进蒙馆，坐在破旧的砧板桌子后面静心苦读。那时的蒙馆只教小孩子识字，先认方块字，再读《养正蒙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幼学琼林》。开蒙读本念完了，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再后来读《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左传》。

岩头塾师管教学生十分严格，每日一丝不苟地教授读、认、写，在学生作业本上圈画朱红。上午学习3小时，下午2小时，除了规定的休息时间，从不放纵学生随意走动耍玩。早晨练字，白天读书。练字有描红、影格和临帖。书读熟了则必须“还书”：站在塾师身边，抑扬顿挫地放开嗓门背给他听。学生不仅背诵课文，还要背注释。背不下来的，就实实在在挨一顿戒尺，背对了的，塾师就用朱笔在书上打一个红勾。接着，学生继续听塾师讲书，讲过以后再读、再背，直到晚上放学。乡邻们





路过蒙馆，听着戒尺打在稚嫩手心啪啪作响的声音，个个心惊肉跳，无人不敬畏一向板正了面孔的塾师。

蒙馆除了寒暑假，每逢重要农事节气也会放假。春分育种清明插秧，小暑小割大暑大割，都要选吉日良辰祭农神、拜祖先。学生家境宽裕的，还由父母领着给塾师送些糕点，或请先生到家里款待一番，以示尊重。李得钊家无力请吃送礼，所幸塾师念其学绩优异，并不计较。李立勋、李立统才免去一番穷人的卑屈。李得钊学习勤奋，加上脑瓜子机灵，记忆力极好，成绩常冠同侪。他也因此有了小小的成就感。

此时，各地新学已随着西学东渐的风潮兴起，蒙馆纷纷转成公立小学堂。小学堂被官府统称为洋学堂、新学堂，不再属私产，统一使用新编的小学教科书，塾师也转成了教员。但科举旧人对中国教育改革后的新教材、新方法所知有限。公立小学名义上叫新学堂，设了堂长，却仍沿袭旧的办学方式。大堂上照旧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的神位。晨间进校、晚间放学，学生照旧要对孔圣人进行两次隆重的鞠躬致礼；照旧教授《三字经》和四书，注重的仍是《论语》和《孟子》，而且只教学生读，不将其中之意讲出来听。学生像被关在玻璃鸟笼里，能看到天空，却无法飞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旧科举就这样在与新教育制度的“双轨对接”中无奈地苟延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戊戌变法和废科举的人渐渐少了，越来越多的上流人士赞成用新学完全取代旧学。在举国办新学的潮流中，永嘉县设教育科，统管学事。新学堂逐渐分为初小和高小两个独立部分，分别称为初等小学校 and 高等小学校（亦合称“两等小学校”）。学校开设了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唱歌、体操、历史、地理、图画等新课程，学制统统改为各三年制，蒙馆的学生可直接转入初等小学校插班就读。

1913年，李得钊免试转入永嘉水西镇公立第九小学校，即岩头初等小学校。公立小学校讲究公事公办，学费还是要缴的。李立勋勉力出了两年学费，就再也供不下去了。1915年，李得钊中断学业，在家帮助父亲和叔叔种地度日。他放不下读书的梦想，每每看到一同在蒙馆里识字的同学在初等小学校读新课本时，总是羡慕不已。贫穷将他与



校门隔开,但他从不把读书看作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每逢农事间隙,他就跑到初等小学校窗下听课,还借来别人的课本在月光下苦读,白天再还回去,成为了一名编外学生。1916年,李得钊以优异成绩考入公立高等小学校,即岩头高等小学校,这让李立勋既喜又忧。

岩头高等小学校的前身是广化学堂,由表山进士郑继恒创办。晚清时期,郑继恒曾在普安寺开蒙馆,以其渊博学识和严师风范被称为最有学问、最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1908年,郑继恒深感一般国民因消息闭塞导致民智不开,于己于国几乎全然无知,非新式教育不能改变命运,因而离开普安书院,与几个有识之士一同前往广化寺创建新学。他们“以国家甲午战争之败,戊戌变法不成,皆有奋发革命之志”,将广化书院改为广化学堂(即岩头高等小学堂,后称岩头高等小学校),不仅延聘科举体制下的饱学之士,还增加了一些新派教员,以打破八股文桎梏,开创了不拘泥四书五经的办学新思路向学生们教授新知识,完全实行新式教育。

岩头高等小学校因郑继恒的崇高声望而成为楠溪江一带最好的学府,也给李立勋带来了新希望。小学校在岩头、周宅、方巷的交汇处,离岩头村约二十里地,规定学生须自备被褥灯油,自带粮食菜蔬,搭伙做饭,寄宿读书。李立勋勉强凑齐了学费,再也拿不出被褥和购买灯油的费用,不免忧心如焚。

李得钊的同学李立敬之父同情李立勋,想出一个颇有创意的办法——让10岁的李得钊与8岁的李立敬同睡一床,被褥和灯油概由李立敬家负担。这样一来,既使年幼的李立敬有人照顾,又使勤勉好学的李得钊能继续就学。于是,李得钊与李立敬一起进入小学校,同堂同桌,同床同被,周六下午放学一同回家,周日傍晚一起返校,朝夕相处了两年。

这时的中国,在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的鼓动下,新文化运动已悄然发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发表大量文章,把攻击矛头直指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提出了“破除迷信”和“解放思想”的口号。他们大力提